
ZHONG GUO

JU XING

WEN HUA

中国句型
文化

● 申小龙 著

SHEN XIAOLONG ZHU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句型文化

● 申小龙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句型文化
ZHONGGUO JUXING WENHUA
申 小 龙 著

责任编辑：谢又荣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净 沙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10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1988年11月第1版
印张：17.625 1991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451千 印数：1 501—4 500册

ISBN 7-5602-0149-0

H·10

精装定价：9.50元



本书作者 申小龙

作者简介

申小龙，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初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江西大学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并任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语文学会理事。已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10部。主要著作有：《中国句型文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申小龙论文集》、《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汉语人文精神论》、《中国文化语言学》、《语言的文化阐释》、《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语言变异与社区文化》、《语文的阐释》等。主编“文化语言学”丛书、“大千语言世界”丛书、《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当代中国语言学论纲》、《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语言学史卷》等。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首届汉字文化学术二等奖，并被国家教委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序

申小龙对《左传》句型的研究开始于六年前。当时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做语料卡片，并尝试建立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系统地解决汉语句型研究中的一系列难题。经过艰苦的努力，他终于以主题句、施事句和关系句“三分天下”，创立了一个新体系。他的硕士论文《〈左传〉主题句研究》不久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这个新的句型体系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学界、甚至哲学界的关注。在随后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小龙终于完成了《左传》全书的句型体系的研究描写工作，并进一步将这一新体系用于现代汉语语料的专书穷尽性分析。此举贯通古今，呈现出汉语句型系统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新格局，并使《左传》句型的研究具有当代意义，这是难能可贵的。

小龙的这部博士论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它首次深刻揭示出汉语句型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联系，首次用科学的语言阐释了中国古代语文研究的句法学传统，将其归结为“句读本位、逻辑铺排、意尽为界”，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化的汉语句型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小龙对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学所依据的各种西方理论和方法作了深入全面、有理有据的剖析，指出西方语言学的句型理论可以借鉴，但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特点。立论严谨，方法新颖，材料翔实，辩证细密。论文答辩委员会给予这部专论这样的评价：“既有纤如丝发的微观具体审视，又有以神役形的宏观理论探讨。瞭知神摄

之法,深得‘易简’之理,允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之典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新的句型学说“震聋发聩,独具慧眼,体现了作者过人的胆略和才气”。论文答辩委员会给予作者这样的评价:“知识博通宏肆,思维清晰敏捷,文笔流利晓畅。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具有相当高的科研能力,洵为中青年语言学者中之佼佼者”。这对小龙的研究工作是极高的评价。

总而言之,《中国句型文化》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学术著作。它体现出作者在语言学及其相关科学的理论方法上扎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视野。它对汉语语法学及其他有关语言与文化学科的研究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导师,我在祝贺小龙成功获得博士学位的同时,期待着小龙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语言学道路!

1987.12.6 张世禄

1987年12月

目 录

序	张世祿	1
第一章 中国语文研究的句法学传统		1
一、结构繁简之法		1
二、结构对应之法		3
三、结构气韵之法		7
四、结构句读之法		10
第二章 《左传》主题句研究（上）		18
一、西方语言逻辑的二元统一观		18
二、“皮之不存，毛将焉傅？”		22
——“主谓”框架之下的汉语语法学		
三、“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36
——汉语句型新论		
四、主题句研究的语言类型学意义		45
第三章 《左传》主题句研究（下）		59
一、以主题语为视点的主题句		59
二、以评论语为视点的主题句		81
三、以主题语和评论语之间逻辑关系为视点的主题句		112
第四章 《左传》施事句研究（上）		121
一、句本位：传统语法的汉语句型图式		121
二、层层二分：结构语法的汉语句型图式		126
三、时间流：汉语施事句的铺排形态		137

第五章 《左传》施事句研究(下)	147
一、单段施事句	147
二、单段施事句微观综论	175
三、多段施事句	201
第六章 《左传》关系句研究	258
一、汉语关系句的逻辑内涵及其表征	258
二、广义因果类关系句	261
三、广义转折类关系句	287
四、广义并列类关系句	291
五、《左传》关系句的逻辑包孕	304
第七章 《左传》句型微观综论	313
一、实词析微：形容词研究	313
二、虚词析微：“而”和“所以”研究	334
三、句法结构析微：“主而谓”研究	352
第八章 《左传》句型系统发展的现代模型	363
一、施事句	364
二、主题句	375
三、描写句	414
四、说明句	415
五、存现句	416
六、有无句	419
七、祈使句	421
八、关系句	422
九、感叹句	432
第九章 汉语句型与民族语言心理视点	442
一、焦点视与散点视	445
二、主谓视与非主谓视	452

三、单域视与双域视·····	456
四、层视与核视·····	459
第十章 中国文化通观下的汉语句法本体论和 方法论·····	463
一、汉语之弹性实体·····	471
二、汉语之流块建构·····	476
三、汉语之神摄方法·····	481
四、语言的人文性与东方功能型研究·····	491
结 语·····	503
后 记·····	513
再版后记·····	515
英文提要·····	548

第 一 章

中国语文研究的句法学传统

“句法”，在汉语中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研究上古汉语《左传》的句型，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古汉语的句子？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需首先了解：古人的“句法”分析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句子观？拿启功先生的话来说，也就是：“中国文言文里，一个句子内部的条件和外形的状态，与‘格郎玛’有什么异同？”

汉语的“句法”概念，出自宋代文人对上古语言材料的分析、理解和阐释。从当时一些文论来看，“句法”这一范畴涵盖四个方面，即：结构繁简之法，结构对应之法，结构气韵之法，结构句读之法。

一、结构繁简之法

语言结构的繁简，有纵横两种视角。纵的繁简，指结构的层层内包。一般说来，西方语言结构的繁简都是结构层次的增省。由于限定动词的单中心地位，规定了句法之繁只能是上下空间层层迭床架屋之繁。而中国古代的句法繁简概念，却是着眼于结构的长短，即“文句长短有法”。

宋陈骙《文则》指出：“春秋文句，长者踰三十余言：短者止于一言。”所谓“长句法”，指“季孙行文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父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鞞。”之类。所谓“短句法”，指“立孙。”“溺。”之类。这里的长短之别，细辨之，则是多动词的接续与单动词立足之别。可见，汉语结构之繁，是左右时间流水贯通之繁。这种以时序（包括实际动作发生次序和逻辑上动作应有的因果次序）展开的流水句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汉语句子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于是迭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

汉语句子的这种特点从英译汉即可了然。英语句子中可以通过动词时态的词形变化，先叙述后发生的事情，或者后叙述先发生的事情。而汉语句子中一般是先发生的事先说，后发生的事后说。为了把英语的空间构架复合的句子译成汉语的句子，就必须从原句中的各个关系词构件中找到相对的时间顺序，按此顺序将各部分重新组合，以成铺排之势，甚至不惜将一个关系词结构转化为一个个动词性结构。

在古人眼里，文句之法既系于文句之长短，那么文法之发展就是语句长短之演进。明曾异撰《与赵十五书》就以这种朴素的“长短”法则来评价汉语句法的发展：“今使缩长句为短句，难；展短句为长句，易。是以从后人而观，则欧苏流畅于韩柳，韩柳流畅于史汉，史汉流畅于左氏，左氏流畅于尚书。然而尚书、左传短节中未尝不畅不劲，秦汉而后，遂以渐加，斯则句从古短，字以世增。”曾说所谓“难”、“易”，实际上揭示了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正确地指出尚书、左传“短节中未尝不畅不劲”，但中国社会在发展，汉族思维也在发展，民族语言心理中的“时间流”法则就以“字以世增”的朴素而有深度的样态发展起来，蔚成流水潺潺、气韵生动之大观。

汉语句子结构的流水样态反映出汉族人语言思维清晰顺畅

的逻辑脉络。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曾称汉语的结构是“*Soberly logical*”，指出汉语语法逻辑性特别强；不象英语那样拖泥带水。赵元任也指出，汉语中“一个表原因或理由的分句不能放在句子后半部用作第二分句。除非(a)作为一个名词谓语，以‘的缘故’结尾，或者(b)是一个事后追补语。”^①启功认为，汉语的文章“以‘文从字顺’为主，上管下多，下管上的极少。主要都是‘因’在前，‘果’在后。”^②这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因果”顺序，是形成汉语流水句的重要的心理现实。

二、结构对应之法

古人“句法”意识的流露，往往见于辞句的对照映衬之中。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曰：“句法则如或排对，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这种于结构对应之中明其法，反映出古人对汉语句法的直观感悟。

句法之对应，首先是由于汉族人对世界作价值判断方式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印欧系语言是一种“单体精确型”的语言。它对世界的观察及其表述，总是从某一个起点（逻辑上的主语）出发来加以陈述，通过形容词、带副词或不带副词的动词，作进一步的规定，使之精确化，抽象化。这种表述是原子论的和推论式的。它关注的是实体，论断的是事物属性。它的价值判断是双元的，即凡事不是 good，就是 bad，不是 right，就是

①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8.

② 启功：《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wrong; 事物不是 clean, 就是 dirty, 常常忽略中间价值。①

汉语是一种“骈体模糊型”的语言。（“模糊”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贬义，因为现实往往是多义的，精确的语句不足以反映。）它不急于对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的互相衬映之中加以感受。它关注的是功能，呈现的是辩证关系，它的价值判断是多元的，迂回的。哲学家张东荪曾引用孟子“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句话，指出孟子对人性的评价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是以一种明确的关系形式表示出来的。其思维结构可以表述为 $A:B=X:Y$ 。这种结构比单个主语“P(S)”的陈述要复杂得多。②它是耗散的，而非静观的；它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它是弹性的，而非硬性的；它是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因而它又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正如一些东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使用欧洲民族的语言可以得出精确的结论。对这一结论可以进行验证、证伪。凡没有被证实的东西，至少可以是‘未被证实的’。这种推论主要采用表语式的表述形式”。这是一种判断，对其尚需按照‘正确或错误’的标准作出决定和评判。中、日文具有一种隐喻的，带有文学色彩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西方往往被称为是诗的风格……论证的过程是比较模糊的。这显然是那种更为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所致。当然，中文、日文都能够传达西方科学的思想，但不那么轻松，因为这种思维并不是与语言结构一同发展起来的。”③

句法之对应，又是汉民族辩证思维的一种外化形态。古代先民早就有“物生有两”、“二气感应”、“刚柔相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思想。《周易》用阴阳交感解释万物，

① 参见 Chase, Stuart, 1978, "How Language Shapes Our Thoughts", in mac Killop, J. (ed), *Speaking of Words: A Language Reade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②③ 参见 J. 加尔通, 西村文子《结构、文化和语言》载西德《列维坦》1984.4. 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

力图在变易、运动之中掌握生活的真谛，即是一种“阴阳之学”。老子亦云：“万物莫不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后世的哲学家更认为“不有两，则无一”（张载）；“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是皆不免有所对”（王安石），“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张载）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声律上即是以声和韵的矛盾运动为基调，反映在词汇孳乳上即是以双声迭韵的对立统一为基本派生关系，反映在句法组织上则是以具有“场”效应的结构对应为基本样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云：“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他以易经中的《文言》、《系辞》为例，指出其“句句相衡”、“字字相俪”、“宛转相承”、“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刘师培在他的文学史讲义中进一步指出：“刚柔判象”、“比物丑类”“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这正道出了汉民族思维结构、语言结构中“偶意”的独特性征。

汉语句法之对应在理解上的原因，是由于对应或对举能在文章的“大气候”之下形成局部的“场”效应，辅助“意合”理解。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汉语的语词往往言简而意赅，汉语的行文也讲究辞约而意丰。汉语文句的理解机制主要是语词意义相互映衬而引发的一种“意合”作用。映衬所形成的语义、语境场周延越大，处于“场”中的单个文句的意义也就越清晰。因而古人为文讲究“文必相辅，气不孤申。”这种“场”效应固然有赖于立言造句所依托的整个题目情境，但它最直接、因而也是最典型的建构则是句法组织的平行对应。《春秋谷梁传》云：“独阴不生，独阳不生”。句法的平行对应不仅使文句意义互相映射，互为补充，甚至“互文见义”，而且使结构关系互为对比，交相印证。它所产生的不是简单重复的“同”

效应，而是“相辅相成的”的“和”效应。《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国语》亦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是在这种“天地之气，莫大于和”的场效应中，句法结构、语义表达都气韵生动起来。读者也正是从这种生气盎然的场效应中把握住语法脉络，完成了“意合”的理解过程。

汉语句法之对应在实践上的原因，是汉字的方块个体形态和古代文章的不加标点。古汉语的结构组织往往要从文句的相互映衬之中加以把握。因此古人的句法概念时时出自辞句对勘之中。或是以上勘下，如《荀子》“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清代训诂学家指出：“取与侵夺，意复且不词。作好侵夺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句法正与此同”。^①或是以下勘上，如《墨子》“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之朝。龙生庙，大哭乎市”。清代训诂学者又指出：“龙生庙，当作‘龙生于庙’，方合上下句法。”^②更奇妙的是，小学家们又从“龙生于庙”对勘出“大哭乎市”应为“犬哭乎市”，方与“龙生于庙”对文。

这种由形到意的结构对勘之法，实质上传达出古人对汉语句法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语感，即汉语的句子组织必然是节奏匀称而辞意对应的。这显然是把握住了汉语立言造句的一个基本方略。这种基本方略与西方语言的句子组织又是大相径庭的。西语的语句组织为了以动词为核心构筑复杂的关系网络，牺牲了句法单位的弹性与简洁，在节奏上只能追求语调弧线的波折，难以企及结构的匀称与辞意的对应。因此，把握西方语言的句子样式，只需从表层丰满的动词形态变化入手提纲挈领即可。而我们的古人却从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找到了一条观察把握汉语句法的独特途径——结构对勘。当对勘贯通之时，就获得一种“句法齐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十一。

② 同上，九。

整”的美感，当对勘阻滞之时，又顿觉一种“句法参差”的不安。这种建立在直感基础上的“句法”范畴，同中国古代语言学建立在声学基础上的“轻”“清”“重”“浊”等音韵学范畴一样，形象而又贴切地传达了汉语组织规律的“脉动”。

三、结构气韵之法

汉语结构之繁简、对应，是一种开合有度，张弛有序的法则。所谓“度”，指结构之繁简不能超脱声气缓急之依托，所谓“序”，指句子组织运行中结构流块的长、短、顿、挫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使语句组织随表达功能的需要，变化而又从容地流畅运行。因此，汉语的结构之法，本质上是一种声气之法。

清人张裕钊有一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意”“辞”与“气”的关系：“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①可见我国的语文学传统正是把“气”看作文句所以形成组织之手段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解说，“气”就是文句之建构。它与“结构”不同在于，它是在运行中动态地、积极地进行的，而非消极地拿语辞去充填某种“动词中心”、“主谓一致”的框架；它是流块顿进的，而非迭床架屋、前呼后拥的“树形”构架。它超越了西方语言句子的固定、静态、机械的句法，把对空间结构之法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时间体势，通过体势的流动来表情达意。

古人的“句法”概念，无不浸润着独特的气韵意识。唐成毛诗指说·文体》云：“发一字未足舒怀，至于二音，

^① 张裕钊，《答吴挚甫书》。